

John Heil - Roanoke 心理健康

關鍵詞：性侵犯，赫爾姆斯（Helms）效應，組織動力學，機構背叛，運動員，體育組織，人際暴力，延遲，否認，誤導，雙重約束

摘要：相關組織的（正確）反應是社會任何事件之公正問題的轉折點。本文試圖解釋具有崇高使命組織如高等教育和體育組織機構，是如何不能充分認識和乾預性侵犯事件，並且容忍甚至實現和濫用性侵犯的。該分析廣泛涉及人際暴力領域，人際暴力作為檢查其組織有可能破壞有效解決性侵犯努力的動態基礎，將赫爾姆斯效應（Helms effect）描述為領導失誤，並確定“機構背叛”的策略。

在進行運動損傷研究時，我和一位同事經歷了一個 Larry Nassar 博士式的情況。在審查大學體育部門的記錄時，我們查到了一個醫學檢查，其上下文不合邏輯，並提示潛在的性侵犯。我們向運動部門報告了這種情況並採取了糾正措施。這種補救措施是在沒有運動員不得不站出來接受質疑或其他審查的情況下完成的，歷史證明這可能很容易對她產生不利影響。

解決方案似乎很簡單，然而，最近國家體操和游泳管理機構發生的事件均表明，這種行為很容易被忽視，並且經常被濫用。在體育組織內的其他形式的人際暴力和違規行為中也發現了類似問題，如沒有意識到或者不作為行為。不僅運動員，而且教練，行政人員和其他人都可能成為性侵犯的受害者。為清楚起見，術語“運動員”表示體育組織中任何和所有人。

組織機構為其機構成員制定標準並創造文化，他們是有監督和管理權的上級機構，他們應該在必要時執行糾正措施。當組織接受“問責制”並尋求針對性侵犯或其他形式的人際暴力的補救措施時，則要製定解決方案。如果不這樣做，問題會被放大。在最壞的情況下，組織可能會與受害者保持一致，以保護自己免受不良後果的影響。對於受害者和被告來說，機構在調查審判和公正懲罰方面都是透明的，這一點至關重要。並非所有被告都有罪，正如針對杜克大學男子長曲棍球隊的性侵犯的錯誤指控所證明的那樣。這個過程

的主要目標不是懲罰本身，而是考察這個機構是否為其既定使命而服務，如果它已經偏離正確方向，則提供糾正。應用適當程序識別有過錯的人，免除無辜的人，並為被侵犯的人尋求賠償。面對這一挑戰，該組織要進行調查考證，確認其既定使命，並保持正確方向。

政策實施的良好預期很容易落空，Peter Donnelly, Gretchen Kerr, Amanda Heron 和 Danielle DiCarlo 的研究調查了加拿大國家和省級體育組織關於人際暴力（如騷擾，欺凌和欺侮）的強制性政策。他們的研究揭示了不遵守國家組織的授權，以及製定不良政策問題。例如，在 68 個組織中，只有四個提供了提交投訴的聯繫方式（摘自“國際體育政策與政治雜誌”，2014 年，第 33-50 頁，“保護體育運動中的青年：檢查騷擾政策”），缺乏明確的尋求補救的途徑，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沒有舉報聯繫人。當舉報或以其他方式尋求補救措施的步驟不明確時，這樣的努力就會受到損害，這就會影響那些抵制問責制的人。

組織機構有時候未能對性侵犯和其他形式的人際暴力的行為負責，如賓夕法尼亞州的性醜聞以及密蘇里大學的種族歧視。這些事件反映了領導層的失敗，這被稱為赫爾姆斯效應。在狄俄尼索斯的希臘神話中，舵手沒有按正確航線駕駛而導致了毀滅。隱喻地說，一個放棄既定使命的組織，就像一艘漂浮著的只有破碎道德指南針的船隻；這發生在其任務就是培養青年和大學運動員個人成長的機構裡，尤其令人擔憂。

當運動員（或其他利益相關者）受到傷害時，未能發現問題並尋求適當的補救措施就是赫爾姆斯效應的例證。如果受到質疑，該組織試圖以犧牲被侵犯的運動員為代價來保護自己免受不利後果的影響，那麼“機構背叛”就會成立。背叛可能是孤立的或系統性的，也可能是直接行動的後果，未能對違法行為及時作出相關反應，而忽略了機構成員在被侵犯時，應該告知他們自己的權利；而（公眾）對具有崇高使命的組織機構的信任，會伴隨著嚴重扭曲的權力動態，將其機構成員（受害者）推向特別脆弱的境地。

在題目為“道德脫離：人們如何去傷害別人和如何生活下去”（2015 年）中，Albert Bandura 詳細描述了對受害者非人性化過程，及其他他們如何免除責任的過程；組織機構通過這種過程傷害別人，並使他們自己過上舒適的生活。通常用於“制度背叛”的有四種策略：延遲，拒絕，誤導和雙重約束。正如經典的斯坦福監獄 Stanford Prison 和米爾格拉姆（Milgram）“服從研究”所

表明的那樣，當一個高度受尊重的機構如備受尊敬的大學或奧林匹克體育組織等使用“制度背叛”時，這些策略的力量會加倍。

在所確定的四種策略中，“延遲”是常用的，並且非常簡單和微妙；它推算倡導者的意願，推遲清算時刻，耽誤和繞過解決方案時機。

“拒絕”是心理學和流行文學中廣泛使用的術語，從良性到惡性的連續行為具有細微差別的意義。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無意識的心理防禦如“拒絕”，最初被用來幫助應對壓力事件所帶來的潛在壓倒性情緒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防禦機制讓位於更適合和更有效的應對措施。滑倒連續統一體，“拒絕”可能源於認知失調，這是一種在遇到衝突的信念和行為時的心理緊張狀態。如果所舉報的犯罪者與被告的地位不一致，則可能出現一種道德上的懷疑，如對事件的心理盲目性；這也許能夠解釋賓夕法尼亞州的性醜聞事件，因為某組織機構未能讓他們自己看到所發生事件的事實。同樣，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反思了他在柏林大屠殺期間的經歷時，將“時代精神”（德語）描述為知情與不知情之間的灰色區域，在這種情況下，不道德的行為被廣泛認可，而不道德行為就經常被忽略，在良性無意識防禦連續體的另一端是徹頭徹尾的惡性謊言。

“誤導”有多種形式，Kenneth S. Pope 將道德安慰劑描述為誤導的手段，個人和組織試圖通過將不道德的行為“旋轉”成聽起來合法的藉口來規避責任。在這個過程中，道德安慰劑錯誤地將注意力從問題的核心移開，並破壞解決方案的步驟。在“心理治療與諮詢倫理學：實用指南”（2011年）中，Pope 和 Melba JT Vasquez 詳細介紹了 8 種語言技巧，22 種理由策略和 22 種邏輯謬誤，將道德上可疑的選項轉化為看似可接受的選擇。因為對情境的透徹理解依賴於全局視野和對語境的認知，所以倫理學安慰劑的使用始於事件的解構。一旦脫離語境背景，語言伎倆、認知理由和邏輯謬誤，便更有說服力。

“雙重綁定”是一種特別陰險和令人煩惱的誤導形式，它抵制簡單的描述。它通常表現為“雙輪”局面，兩種懲罰性選擇之間會帶來選擇的錯覺。R.D. Laing 在《Knots》（1970）中對詩歌、心理學和社會評論幾個方面聯合進行了深刻的闡釋。

他們正在玩遊戲，他們在表演不玩遊戲。

如果我向他們展示我看透了他們，我將違反遊戲規則，他們將懲罰我。

我必須玩他們的遊戲，沒有表示我看透了他們的遊戲（1）。

當組織未能以提供補救的方式行事時，則受害者面臨著雙重約束-或者離開組織，或者接受制度背叛作為持續成員資格的條件。 **Carly Parnitke Smith** 和 **Jennifer J. Freyd** 將此描述為“第二受害”，因為那些在組織中擁有地位的人不會受到他們行為後果的影響，而否定了運動員的正義價值觀，並且顯著加劇了犯罪（“機構背叛”發表於 2014 年的“美國心理學家”雜誌，575-587）。

鑑於組織對個人的權力，雙重綁定很容易實現；使用這種或者其他類似的策略不僅向受害者，而且向所有觀察者發出強有力的信息，這些行動定義了組織的深層文化，並為預期行為設定了標準。具有諷刺意味的謊言是作為公眾面孔的理想主義使命與真正文化之間的脫節。在《倡導體育：挑戰、爭議、道德和行動》（2016）中，作者提供了一個詳細的案例研究分析，其中闡明了“機構背叛”的策略。在“機構背叛”的情況下，補救的希望可能依賴於舉報人的意願。但是，在舉報時，各階層的舉報者都面臨著報復的風險。舉報的行為越具有攻擊性，對道德水平要求越高，這樣做的潛在負面影響就越大。對於也是受害者的舉報者來說，賭注便升級了。例如，貝勒大學足球隊成員普遍存在性虐待問題，舉報的女性受到了校園社區的嚴厲批評；還有 **Lizzy Seeburg** 的故事，她舉報了一名巴黎圣母院足球運動員的性侵犯問題，不久後 **Lizzy Seeburg** 自殺。她經歷了典型的告密者-受害者困境：報告事件、遭受羞辱和尷尬，或承受審判的壓力-或保持沉默；由於犯罪者沒有什麼不良後果，他們可能會更膽大妄為。由於威脅到了足球隊以及該機構的威信，而警察也沒有及時進行調查，這種無能為力和絕望可能會導致驅使受害者的自殺行為。可悲的是，在使受害者保持沉默時，自殺便成為為犯罪者服務的工具。

儘管如此，勇敢地說出真相可以扭轉局勢，在全美游泳運動員 **Brock Turner** 性侵犯事件之後，由 **Emily Doe** 準備的書面雄辯陳述，勇敢地證明了這一點。在四天內贏得了 1100 萬讀者，她的努力給那些因為害怕後果而屈服於羞恥和沈默的人發出了訊號，並鼓勵受害人挺身而出。

DA, John Heil 是弗吉尼亞州 **Roanoke** 心理健康的持牌臨床心理學家和持牌（表達性治療）運動心理學顧問。作為美國心理學會運動和比賽心理學分會的主席，他領導了一項體育宣傳、欺侮和人際暴力的倡議。他是 **Roanoke** 防護性侵犯反應的前董事會成員。可以通過 jheil@psychhealthroanoke.com 聯繫。